

# 民族—国家的“交织”与历程

## ——基于国际移民的历时背景考察

彭 谦 程志浩

(中央民族大学 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院 北京 100081)

**摘 要:** 民族国家最先形成于欧洲,其后扩散至全球。对于民族和国家这两概念的“交织”与逻辑先后,一直受到学术界的讨论。民族国家的内涵是现代性,在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国际移民的流动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正是国际移民的流动,民族国家的演变形态不断被塑造。本文基于国际移民的历时背景维度,来探讨民族—国家的“交织”与逻辑、演变历程及“超越民族国家”这一新的范式。

**关键词:** 民族—国家; 国际移民; 超越民族国家

中图分类号: D63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4-4922(2020)04-0006-07

DOI:10.16415/j.cnki.23-1021/c.2020.04.002

从历史的视野来看,西方民族—国家的建构始终伴随着移民和融合政策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新独立国家的研究认为,民族—国家建构是非殖民化进程的一个必要方面,尽管有些混乱<sup>[1]</sup>。建立一种可行的民族文化的任务被看作是现代化的明显必然结果,是西方民族国家建设的一种模式。在勒纳(Lerner)和罗斯托(Rostow)等现代化理论家的著作中,民族—国家的建立和民族—国家的形成自然地成为同道,因为民族国家模式是唯一可以思考的组织政治的方式。那么,探讨民族—国家的建构就显得特别有意义。

### 一、民族—国家的“交织”及其逻辑

关于民族国家的内涵分析以及各国的建构历史,学界已有大量论述。学界围绕民族国家内涵的分析有以下代表性的分析思路:阶级与经济分析、关注民族国家的要素、民族与国家两种结构与

原则的熔合、历史社会学的制度分析、综合分析等思路。在各国的建构历史研究方面,学者们围绕着各国的历史、国体、政体、对“民族”的不同理解、国家认同、民族认同等不同要素进行分析,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民族国家类型。但对于民族—国家的“交织”与逻辑先后,以及探讨国际移民对于民族国家演变历程的塑造论述不多。笔者聚焦于国际移民这一线索,探讨民族—国家的“交织”与逻辑先后以及演变历程。

#### (一) 蒙特维多公约: 国家的定义

在国际关系中,“国家”一词是日常用语的一部分,但其确切含义尚未确定。没有明确界定国家概念的国际协定。“国家”概念的定义确实存在,并载于《蒙特维多国家权利义务公约》(1933年)<sup>[2]</sup>。第1条规定“国家作为国际法人应具备下列资格: a) 永久居民; b) 界定的领土区域; c) 政府; d) 与其他国家建立关系的能力<sup>[3]</sup>。这些事实条件很容易描述和证明。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就

收稿日期: 2020-05-20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世界主要多民族国家的民族政策实践及对我启示”(15JZD034); 2019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从文本到实践的新时代民族事务法治化研究”(19BMZ044) 成果

作者简介: 彭谦(1966—),女(瑶族),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民族区域自治与民族工作、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民族法学研究;程志浩(1991—),男,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民族区域自治与民族工作、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

是国家对公民的责任。如何才能满足公民的需要和愿望?从国家和公民之间关系的角度来看,我们将提到国家以下几个功能:

1. 为参与政治决策创造空间,使政治对公民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
2. 保障人民群众免受内外侵略者和罪犯的侵害;
3. 提供公平,使人民得到平等、公正和无歧视的待遇;
4. 提供基本社会服务,使人民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5. 创造便利经济生活的基础设施,制定公平经济生活的规则。

## (二) 民族与国家的“交织”

民族和国家不是一回事。然而,比较它们的定义,并考虑它们所共有的要素,很明显,在现代性中,民族与国家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这就是霍布斯鲍姆和盖尔纳所描述的现实:今天我们谈到国家的时候,只能把它和“民族国家”联系起来。把它们称为单独的实体是没有意义的。民族是一种现代现象,必须在现代民族国家世界的框架内加以理解。民族强调构成国家的共同体主体性,它关乎认同、想象力和文化等。国家是客观的,它涉及人民、领土和机构。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为国家和民族的相互交织奠定了基础,它决定了主权国家这一新生事物。

但是,如果我们不能把民族和国家说成是不同的实体,我们又如何理解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呢?如果它们真的是相互交织的,我们怎样才能理解两个方向上的联系呢?

1. 民族是否以国家为前提?《蒙特维多国家权利义务公约》定义了国家的概念,但没有对民族作出定义,也没有提及文化、认同等对民族重要的要素。

但从国家本身的角度来看,国家是否以民族为前提的问题的答案就不那么明确了。在解决这个问题第一个办法中,国家必须在坚实的基础上建立对其人民(及其领土)的权威。国家地位是国家能够创造一种归属感的必要先决条件,这种归属感是人民自愿接受国家权威——使他们缴纳税款并遵守其法律和规章——所必需的。建立在国家基础上的归属感使人们可以想象为国家献

身<sup>[4]</sup>。没有国家地位,国家必然会采取强制和专制措施来维持其权威。

第二种方法则不那么明确:在强调个人自治的现代世界,文化和身份问题已变得越来越个人化,而不那么集体。大规模移民加剧了这种转变。由于人们和文化的多样性,他们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单一民族国家的边界之内,国家地位正变得有问题。人们甚至想知道,是否仍然有必要建立国家和归属感。如果国家能够像一个理性的承包商一样为其人民服务,提供安全、公正和社会服务,这可能足以建立必要的忠诚,使人民缴纳税款并遵守法律。西欧移民国家所面临的冲突归结为这样一个问题:移民在多大程度上成为国家的一部分,并接受国家认同?迄今为止的态度是,移民必须采用现代民族国家的社会和政治制度。一体化是一个系统的、制度化的民族国家所采取的措施。但欧洲民族国家不接受移民仅仅停留在与国家的合同和法律关系中。“主导文化”的出现提出了这样一个辩论,那就是东道国的文化和身份是不是移民必须接受,而移民自身的文化和身份应该保持从属地位。

国家需要民族,而国家的概念应该是一个包容的概念:国家的机构及其对暴力和胁迫的垄断需要一种人民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这种归属感和认同感体现在国家的地位上。但是,这种确认应具有包容性。移民和多样性并没有使国家地位过时;它们使归属感更加复杂和具有挑战性。没有这种归属感的投资,社会就会面临稳定和国家分裂的风险。

2. 国家是否以民族为前提?我们能想象一个没有国家和制度的民族存在吗?特别是对于那些强调民族共同体在现代国家成立之前就早已存在,民族不需要国家就能存在,它的合法性就是民族认同,区别于其他群体。

阿德里安·哈斯廷斯(Adrian Hastings)认为,英国的身份认同是一种现实,从12世纪开始逐渐形成,远远早于国家及其机构的存在。对于坚持以更原始的视角来看待民族的学者来说,民族认同的深层历史根源(神话、圣地、建筑、领土等)使得民族脱离国家存在,成为一种事实<sup>[5]</sup>。当伊弗雷姆·尼姆尼(Ephraim Nimni)说:“……我们用‘民族这个词和‘国家这个词是可以互换

的。”这种假设在世界各地都很普遍,但它是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基础上的。国家是治理的工具,民族是文化共同体<sup>[6]</sup>。卡斯特(Castells)举了加泰罗尼亚的例子<sup>[7]</sup>。由于历史原因,加泰罗尼亚语和西班牙语不同,他们的“与众不同”还表现在国旗、国歌中。他们的野心往往包括要求成为一个国家,以便能够充分而不受限制地实现其特性<sup>①</sup>。库尔德人的例子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他们分别居住在伊拉克、土耳其和伊朗,随着他们民族认同(文化、语言、神话)的提升,一直也有建立一个新国家的雄心。同样的,苏格兰和加泰罗尼亚的运动旨在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民族认同与英国、西班牙不同。

从公民的角度来看,民族和国家之间的分离会使一个人失去对更广泛的共同体的归属感。与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形成对比的是,个人的归属感将局限在一个比自我的家庭、同事、朋友和邻居社区大不了多少的圈子。意味着公民与他/她所属的更广泛的社会或国家之间没有情感纽带<sup>[8]</sup>。有人可能会说,在高度个体化的西方世界,国家作为想象中的共同体的作用不再那么重要了。

在现代性中,民族和国家、客观集体和主观集体这一相互交织的现实变得越来越不可分割,因为国家履行某些职能,有助于实现对国家地位至关重要的归属感,即提供安全、正义和社会服务。

因此,在我们当今的现代世界中,民族和国家是密不可分的。在民族国家与人民的关系中,合法性有四个重要依据:(1)代表人民行使主权;(2)法律面前享有平等权利的人;(3)人民作为义不容辞的团结互助的群体;(4)人民作为一个共同体,通过共同的命运和共同的文化而团结在一起<sup>[9]</sup>。

## 二、国际移民流动背景下民族—国家建构的演变历程

我们把“民族—国家”建构定义为一个进程,在这个进程中,公民感到有足够多的共同利益、目标和偏好,使它们不希望彼此分离。1860年,法语对于一半法国儿童来说仍然是一门外语。那时候的法国是一个拥有不同语言、方言和不同货币的国家。到自己村庄以外很远的地方旅行是罕见

的,对法国政府漠不关心或怀有敌意是常见的。从法国大革命到整个19世纪,法国统治者都表达了“组建法国公民”的必要性。意大利统一后(1860年),一位当时统治意大利北方的精英领导,马西莫·德·阿泽廖(统一意大利的创始人之一)曾经有一句名言“意大利已经形成;现在只剩下意大利人了。”1860年,意大利人口中最多有10%说的是意大利语,当时只有一条铁路线穿过统一前的所有区域,而且许多人公开敌视这个新国家<sup>[10]</sup>。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间,法国和意大利的统治者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旨在民众中建立共性,并“形成”他们所认定的“法国人”和“意大利人”。他们引入了国家控制的教育,包括小学义务教育;在学校、宗教服务和行政部门中禁止使用“国家语言”以外的其他语言;实行义务兵役制度,其目的往往是使来自该国不同地区的人融合和混在一起;除此之外,还拓展了公路和铁路交通。

法国和意大利只是两个例子。历史同样也见证了许多民族—国家建构的努力。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观察到“几乎所有的欧洲政府最终都采取了使其人口同质化的步骤:采用国家宗教、驱逐少数民族……建立一种民族语言的机构,最终组织大规模的公共教育。”<sup>[11]</sup>霍布斯鲍姆(Hobsbawm)指出,“国家将利用日益强大的机器即小学,与当地居民交流的,传播国家形象和国家文化”“统治者往往通过公共教育和行政机制来使得他们的语言成为实际的官方语言”<sup>[12]</sup>。相比之下,欧洲精英并没有在他们的殖民地实施这样的政策<sup>[13]</sup>。然而,一旦这些殖民地在20世纪50年代及之后获得独立,许多国家就出台政策,创造一种民族—国家语言和民族—国家认同,类似于19世纪欧洲的政策<sup>[14]</sup>。20世纪还出现了独裁者和政治精英,他们通过禁止当地文化和试图将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于人,通常是通过令人憎恶的手段,例如纳粹德国、佛朗哥的西班牙等,来建立同质性<sup>[15]</sup>。民族—国家建构在21世纪依然很重要。

<sup>①</sup> 美国和加拿大的土著人情况不同,他们通常被称为第一民族,以确定他们是原来的居民。根据与殖民者的条约,他们被授予领土和相关资源(捕鱼和狩猎)的权利。

民族—国家建构分为了四个时期,笔者使用时间段作为全球历史变迁的标记:1870—1918年、1919—1945年、1946—1989年、1990—至今。

(一) 强烈的民族国家建设时期与劳工移民的流动(1870—1918年)

关于民族—国家的历史叙事始于19世纪70年代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这一时期的特点是两种趋势,它们以复杂的方式相互关联,但很少有人探索。

首先,这是一个强烈的民族国家建设时期。铁路帮助开拓了全国农产品和工业品市场。国家邮政事业对国民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平等的公民法律废除了封建因素对企业等经济活动的最后限制。公共教育和公共卫生促进了公众对民族国家的具体体验,因为年轻人发现自己被局限在教室里,接受国家礼仪的传授;而公众成员发现他们的私人消费和身体习惯成为公共教育和讨论的主题。在许多国家里,投票权扩大到这一新受过教育的成年男性群体。总之,公民、主权和国家在这一过程中被创造。

其次,这一时期也被称为“美好时代”,它是一个对劳动力需求急剧增长的时期,其间也不时出现经济的崩溃、停滞和衰退。这些波动标志着欧洲和美国的工业发展,同时也会给墨西哥、巴西、阿根廷、日本、俄罗斯和土耳其产生联系和影响。正是在这个时期,工业资本家为寻求更高的利润来源,转而采用新形式的全球融资和投资。公司成为重要的公共行为者,其权利受到其所在国家的保护。他们形成了垄断和卡特尔,并且进一步推动了全球化的发展<sup>[16]</sup>。

虽然工业是在这些国有化国家的范围内发展的,受到关税的保护,不受资本主义利益的竞争,但与国家利益相关的商业竞争,开启了一个新的殖民主义征程。这是欧洲国家“争抢”非洲的时代,也是欧洲国家和美国在控制加勒比、拉丁美洲和亚洲生产的原材料方面竞争加剧的时期。

在一个民族国家建设和高度全球化的时期,劳动力在全球范围内广泛迁徙,在世界各地,特别是在殖民地,契约劳工取代了种植园上的奴隶<sup>[17]</sup>。波兰人和意大利人移居法国北部;瑞士欢迎不同的人口;德国的工业发展促进了东部和南部的移民。巴西欢迎来自欧洲、中东和日本的移

民。印度和中国的劳工去了加勒比、非洲的南部和东部。墨西哥人、土耳其人、叙利亚人以及南欧和东欧的人口移居美国<sup>[18]</sup>。

然而,一般来说,这段时期甚至不需要护照和入境证件。大多数欧洲国家废除了他们在19世纪上半叶建立的护照和签证制度,法国在1861年率先消除了这种阻碍劳动力自由流动的障碍。到1914年,所有这些文件在欧洲几乎都被销毁<sup>[19]</sup>。工人们迁移到有工业发展的地区,当经济不景气时,他们就会返回家乡或去其他地方。瑞士、法国、英国、德国、美国、巴西和阿根廷依靠在工厂、田地、磨坊和矿山工作的数十亿劳工移民建立了工业化经济。

但有些学者认为这些跨国界的政治活动和接触也导致移民破坏了国家的稳定和领土限制,甚至有时候,移民也被视为政治上的危险人物。从国家或种族的角度来看,他们的看法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们的存在被认为危及公民、主权和国家之间的同构。与此同时,在欧洲,政治领导人面临着密集工业化的政治后果,全球化进程加剧了贫富之间的巨大差距,国际主义革命工人运动加剧了对非国民的不信任和仇恨,这种不信任和仇恨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爆发。

(二) 边境管理与限制移民(1919—1945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劳动力自由流动和迅速的全球化进程。战争导致了经济的崩溃,然后是许多地区重新组成新的独立国家,这些新兴国家也开启了边界的持续关闭。与此同时,民族国家形成的好战进程,包括其所有的种族清洗和由此引起的大规模人口流动,是(而且仍然是)产生难民的主要力量<sup>[20]</sup>。

以国家荣誉和独立的名义进行的大规模屠杀使国家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具有了前所未有的合理性,使国家关系不仅成为战壕中的生死问题,而且也成为整个社会的生死问题。基于民族背景的敌我区别已经成为一种常识性的实践和意识形态。当时的政治动荡,资本主义的萧条被德国武装起义的革命政治和西班牙共和制的崛起所抵消,促使民族主义国家努力加强边境管理,限制政治和劳工活动人士的活动。

以前为发展移民管制制度所作的努力已得到修订,并发展成为历史上新颖的边境警务形式。

现在有必要让一个人获得进入一个国家并在那里居住的许可证,这既造成了不需要这种许可证的国民与外国人之间的差别,也造成了国家合法居民与非法居民之间的差别。颁发许可证的权力集中在中央政府。在美国,这种权力最初是由各州争夺的,而后由联邦政府管理,它加强了联邦政府的地位及其在划分国家与敌人界限方面的作用。在欧洲,新的签证制度开始将在一个国家居住的权利与工作许可联系起来,实际上将外国人界定为临时工。简而言之,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一个监督、限制和控制移民的中央国家机构被制度化。根据边境控制的逻辑和日益增长的安全问题,移民现在是这个国家的天敌。

移民运动与接受移民的国家是对立的,后者的社会似乎固定在一个同质的民族文化中。在种族关系周期中,非裔美国人与移民放在一起,把他们描绘成美国以外的人,尽管他们自美国被征服以来一直是美国人口的一部分<sup>[21]</sup>。

移民现在不仅被视为一种安全风险,而且还被视为破坏国家与人民之间的同构,从而对正在进行的民族国家建构项目构成重大挑战,不断迫使同化机制吸收新的文化异质浪潮。民族国家的建构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国家的边界内存在着阶级、文化、性别和地区之间的巨大差异的事实,使民族国家建构的过程变得更加复杂。

事实上,在我们看来,正是这一时期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的降低,促使并促进了民族国家建设的质的飞跃。民族国家内部的社会秩序成为新社会科学和移民研究的前提。甚至在以前的全球化时期曾有过一段自由劳动力迁移的时期,这一事实也很快被遗忘了<sup>[22]</sup>。

(三) 民族国家间的“铁幕”与严格的移民监督(1946—1989年)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称为冷战的时期,几乎完全抹去了民族国家形成的跨国和全球进程的历史记忆以及移民在其中的作用。现代化理论使西欧和美国似乎在自己的领土范围内发展了民族特性和现代国家,而不是与全球经济和思想流动相联系。联合国的发展和给予大多数前殖民地正式独立,使人们普遍认为,世界被划分为许多具有同等重要性和主权的民族国家。由于坚持认为每个人都必须属于某个地方,欧洲战后流离失所者

和难民的处境迅速改变。在美国的学校里,孩子们唱爱国歌曲。在全世界,公民教育已被等同于爱国主义的课程。人们被设想为每个人只有一个民族国家。

冷战的紧张局势和猜疑要求对边界进行更严格的监督,并对所有寻求跨越国界者的动机进行仔细调查。移民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要想越过铁幕,一个人必须是政治难民。在西方,只有那些“逃离共产主义”的人才拥有永久迁移和定居的权利。否则,人们认为,国界应限制人口的流动,并作为容纳和培育民族文化的容器。然而,随着战后工业结构的重组,以及大萧条和战争使旧大陆人口减少,西欧和美国出现了对劳动力的新需求。

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法国和荷兰转向他们自己的殖民地居民,这些人受过教育,把殖民国家视为母国,并与这些母国分享语言和教育体系。西德试图通过雇佣客工的劳动合同来限制和控制工人的涌入。面对东德的竞争,战后西德领导人面临着在给予公民丰厚社会福利的基础上达成民族共识和实现劳动和平的迫切性。外来工人被视为解决战后重建和工业发展的一个恰当办法,因为他们将贡献自己的劳动力,而不会破坏德国领导人试图与其公民缔结的文化或经济协定。法国人民最初被视为一个由民主进程维系在一起的政治共同体,通过将公民转变为国家成员的自动宪法行动。因此,移民通过在政治上的被纳入,这意味着文化同化,并成为法兰西民族的一员。

(四) 民族—国家建构中“人民的民族化观点”(1990—至今)

然而,在全球化时期出现的民族国家建设最终催生了“人民”的概念,这将极大地影响移民,并改变社会科学家对移民的看法。“种族”和(或)“种族”人的概念开始取代“公民”概念。“公民”概念最初是由启蒙哲学家们塑造的,并在美国、法国革命的过程中具体化。现在,人民主要意味着一个通过共同的祖先和共同的家园而团结在一起的国家,无论其成员可能在哪里流浪。人民的这一概念赋予了每个国家自己的民族性格、独特的性质和家园,并要求在阳光下占有一席之地。这种对人民的民族化观点是在欧洲日益激烈的政治竞争中形成的。在所有国家建设的历史中,都可以看到这一点,尽管法国和德国之间有很多

评论的差异。民族沙文主义和种族主义使当时的殖民帝国建设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这种竞争的高潮合法化。

随着民族主义与社会观念的确立,移民观念开始发生变化。进入21世纪以来,虽然移民的流动一般仍不受限制,但移民开始被概念化为继续在其祖籍国拥有成员资格。许多行动者促进了这一思想的普及,非本国公民的存在对国家主权和安全构成重大危险。

### 三、“超越民族国家”——“民族—国家”范式的转变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民族—国家作为基本分析单位向着全球系统的范式转变。大量的研究机构、非政府组织和政府间组织应用而生。民族国家在国际和国内问题上失去了一些分量,民族—国家之间需要结成联盟来捍卫和促进他们的利益。

#### (一) 全球化带来的范式更新

全球化打破了宏观社会中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分析框架。社会结构正在走向跨国化,与这种本体论的变革同步,需要一种认识论的变革。一项新的跨学科跨国研究应以民族—国家作为基本分析单位向全球系统的范式转变。

社会学,以及一般的社会科学,正试图将研究整个世界的重要性日益增加,美国和其他地方的大学出现了专门从事“全球研究”或“跨国研究”的多学科单位。与此同时,大量的研究机构、非政府组织和政府间组织致力于探索全球化的不同层面,包括全球化的性质、后果和政策含义。

全球化使社会学和国际关系学的现有范式陷入僵局。走出这一僵局的出路是打破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分析。范式由特定的本体论假设和特定的认识论原则构成,并包含一套理论原则。最重要的是,它们提供了要应用这些原则去开展研究工作。尽管民族国家的理论原则不同,但是这些范式无法解释全球化带来的越来越多的异常现象。

民族国家范式描述了给定一组历史结构的运动是如何发生的。但在本体论意义上理解运动分析所依据的历史结构的基本变化,揭示了其局限性。民族国家不是跨历史的。好的社会分析要求我们不仅要研究一组给定结构的运动规律,还要研究这些结构的转换——包括历史结构的共时性

和历时性维度。民族国家制度是历史上生产、社会阶级和领土之间的特定对应关系,这种对应关系导致了特定的政治形式成为民族国家。民族国家的物质基础目前正在被全球化所取代。因此,真正的跨国研究需要回归到国家的理论概念,而不是作为一个“东西”,而是作为插入更大的社会结构的一种具体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结构可能采取不同的、由历史决定的体制形式,民族国家只是其中一种形式。

民族—国家制度是一种历史产物,是资本主义形成的特殊形式,其基础是生产、阶级、政治权力和领土之间的复杂关系。这种关系现在正被全球化所取代。曼恩(Mann)展示了资本主义在欧洲出现时,领土国家体系是如何作为资本主义重要组成部分出现的,从那以后,这个体系一直主导着国际关系。然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本身导致了“许多生产网络的出现,这些生产网络是分裂的、处于战争状态的,而且整个阶级结构是国家分割的”<sup>[23]</sup>。曼恩(Mann)指出了构成社会权力的四种基本的社会互动网络: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和胁迫。他对“社会”的概念提出了挑战,认为每一个历史时期都应该根据这些相互作用的网络来分析。

#### (二) 全球化世界中的民族国家

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大前研一(Kenichi Ohmae)预测“民族国家的终结”。然而,我们已经进入了新的千年期,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由于全球化,民族国家在国际和国内问题上失去了一些分量。在经济领域,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

资本的自由流动和跨国公司的灵活性逃避了民族国家的调节作用。20世纪90年代下半叶和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表明,民族国家缺乏控制。许多工业企业已将生产转移到中国,世界贸易组织(WTO)制定了一套具有约束力的国际贸易规则,限制了民族国家的经济政策空间。

在政治层面上,全球化也带来变革。区域机构的数目和影响力都有所增加;从非洲的非洲联盟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到欧洲联盟,从拉丁美洲的南方共同市场和东盟,人们普遍认为,各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小。他们需要结成联盟来捍卫和促进他们的利益。

此外,在国际法领域,公民要求超越国家法律

范围的权利的空间越来越大。欧洲法院和欧洲人权法院是公民间用来挑战国家管辖权的著名机构。最后,在安全领域,早已建立了区域安排(北约组织、东盟),以便在外国侵略时提供相互支持。

#### 四、结语

在全球化的世界里,民族国家仍然是力量和影响力的源泉。早些时候建立的民族国家为其公民履行重要职能:为政治参与创造空间,提供安全、公正和基本社会服务,组织基础设施和经济生活。在现代性中,民族和国家、客观集体和主观集体这一相互交织的现实变得越来越不可分割,民族—国家建构在国际移民的历时发展过程中也分为了四个时期:1870—1918年、1919—1945年、1946—1989年、1990—至今。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分析越来越难,社会结构正在走向跨国化,与这种本体论的变革同步,需要一种认识论的变革。一项新的跨学科跨国研究应以民族—国家作为基本分析单位向全球系统的范式转变。

#### 参考文献:

- [1] Wallerstein, I. (1961) *Africa: the politics of independence*, New York: Vintage.
- [2] <https://www.ilsa.org/Jessup/Jessup15/Montevideo%20Convention.pdf>.
- [3] <https://www.ilsa.org/Jessup/Jessup15/Montevideo%20Convention.pdf>, Article 1 The state as a person of international law should possess the following qualifications: (a) a permanent population; (b) a defined territory; (c) government; and (d) capacity to enter into relations with the other states.
- [4] Benedict Anderson (2006),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pp. 7.
- [5] Adrian Hastings (1999).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6] Ephraim Nimni (2007), *National – Cultural Autonomy as an Alternative to Minority Territorial Nationalism*. pp. 55.
- [7] Castells (2010), *The information age: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 2. The power of identity. pp. 45 – 53.
- [8] Martha C. Nussbaum (2013), *Political Emotion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9] Wimmer & Glick Schiller 2002, *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 and beyond: nation – state building, migration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pp. 308.
- [10] Duggan (2007). *The railway line was the Piacenza – Bologna line*, Schram (1997).
- [11] Tilly, C. (1975) “Reflections on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State – Making.” in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C. Tilly e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2] Hobsbawm, E. J. (1990)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Programme, Myth, Real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3] Michaopolous, S. and E. Papaioannou (2012) “The Long – Run Effects of the Scramble for Africa.” NBER Working Paper No. 17620.
- [14] Miguel, E. (2004) “Tribe or Nation? Nation Building and Public Goods in Kenya versus Tanzania.” *World Politics*, 56, 328 – 62.
- [15] For example, Franco declared his aim to create “a single language, Castilian, and a single personality, the Spanish one”, Jones (1976).
- [16] Held, D., A. McGrew, D. Goldblatt and J. Perraton (1999) *Global transformations: politics, economics and culture*, Oxford: Polity Press.
- [17] Potts, L (1990). *The world labour market: a history of migration*, London: Zed Books.
- [18] Wyman, M (1993). *Round – trip to America: the immigrants return to Europe 1880 – 1930*,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19] Torpey, J (2000). *The invention of the passport: surveillance, citizenship and the stat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0] Sassen, S (1999). *Guests and aliens*, New York: New Press.
- [21] Lieberman, S (1980). *A piece of the pie: black and white immigrants since 188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22] Gabaccia, D. R. (2000) *Italy’s many diasporas: elites, exiles and workers of the world*,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 [23] Mann, Michael. (1986).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515.

[责任编辑 谷文双]